

目录

第一章 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1
一 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
二 凯恩斯的反动立场.....	4
第二章 虚伪透顶的“就业理论”	8
一 所谓“有效需求”与就业.....	8
二 “消费不足”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性”吗?.....	12
三 “投资不足”是因为利润太低吗?.....	18
四 利息是“心理现象”吗?.....	28
五 凯恩斯理论的“新发展”	31
第三章 凯恩斯的救治方案	38
一 赋税政策与收入再分配.....	39
二 金融政策与工资政策.....	44
三 “投资社会化”与赤字财政政策.....	49
四 对外经济扩张政策.....	55
第四章 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58
一 凯恩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及其实践.....	58
二 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经济.....	64
结束语	74

第一章 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一 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凯恩斯主义是庸俗经济学的的一个流派。它提出了一套稳定经济的理论与纲领，企图借此来克服危机，消灭失业，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神话曾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近三十多年来，它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核心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一种理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形势下产生的。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它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没落。因此，我们要了解它的本质，首先要说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高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贫困，使得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越发尖锐化和复杂化了。同时，企业开工不足，工人大批失业也已成为普遍的、经常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平均开工率只有生产能力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在英国，从1915-1935年的二十年中，生产设备的开工率平均为67%；美国从1925-1934年的十年中，最重要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有57%。由于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就将千百万工人关在工厂大门以外，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例如英国在1900-1913年间，失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摇摆于2.1%与7.8%之间，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失业人数达到9.7-22%。在美国，失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平均百分比从1900-1913年的8.4%增长到1921-1936年的15.8%。这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失业的严重情形较之战前年代大大增加了。

大批工人失业成为经常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产业后备军在危机时期扩大，在高涨时期则比较小。可是到了战后，情况根本改变了。即使在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失业规模也很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有几千万失业工人，他们从产业后备军变成了失业的常备军。这可以从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

	1921年 (危机)	1922年	1924年	1929年	1932年 (危机)	1935年	1938年
美国	27	22	16	11	48	36	37
德国		13	11	10	22	15	13
英国		9	19	9	30	12	

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和大量失业的长期存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在这种情形下，要想牧歌式地把资本主义描绘得天花乱坠，已经成为极端困难的事情了。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最长久、最广泛的周期性危机，生产的缩减和失业的范围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此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四、五千万人。劳动大众的生活更加贫困，这也就促使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展开，在英、美、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游行示威和罢工的新浪潮，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趋衰落。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益瓦解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形势下，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自行调节的理论完全破产了。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思想体系来挽救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三项新任务：

第一，掩盖现代资本主义种种矛盾之所以极端尖锐化的真正原因，粉饰资本主义现实，证明资本主义经过“调整”还能够继续发展。

第二，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权力向劳动大众猖狂进攻找根据，为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作辩护。

第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

于是，在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思想家——凯恩斯粉墨登场了。

二 凯恩斯的反动立场

以上我们说明了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在简单谈谈凯恩斯的生平与活动。这对于了解凯恩斯主义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帮助的。

凯恩斯是英国人，生于1883年，死于1946年。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主任，又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担任过剑桥市长。凯恩斯本人在剑桥大学时学习数学，但毕业后却考取了文官，起初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做官，1913-1914年，他被任命为印度通货与财政皇家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进财政部，担任财政方面的机密工作。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整个协约国财政方面的一个主要策划人。他也做过英国自由党的军师。1928年自由党在竞选的党纲“英国工业前途”中主张通过公共工程和通货膨胀政策来消灭失业现象，主要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他担任英国内阁财政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可见凯恩斯一生的活动都是与统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除政治活动外，他也经营私人企业。他是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曾经创办过三个投资公司。所以凯恩斯不仅一生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而且他本人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

凯恩斯还以统治阶级谋士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他一生参加国际会议很多，他参加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1920年热内亚国际经济会议。他也是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人物。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里敦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为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出谋划策。1945年英、美举行借款谈判时，他是英方的首席代表。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他被任命为董事。

凯恩斯不仅是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家，而且是垄断资本的理论家。他从年青时起，就积极替资本主义作辩护。他长期在剑桥大学教书兼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从1912年起他是英国著名刊物《经济杂志》的编辑，同时他还办了一些通俗刊物，如《伦敦民族周刊》（后因合并改名《新政治家与民族》），在当时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更可以看出这个垄断资本卫士的真正面目。他的第一本书叫做《印度的通货与财政》，出版于1913年。在这本书里，他主张把印度的货币紧紧地同英国的货币联系在一起，以便替英帝国主义进一步在经济上掠夺印度铺平道路。凯恩斯的成名是在1919年，这时他发表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列宁写道：“**谁也没有象英国驻凡尔赛代表凯恩斯在他的小册子中那样生动地描画了凡尔赛条约。**”（《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的“战前欧洲”一章中，凯恩斯由于他那强烈的阶级本能和嗅觉，已经预见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将使资本主义难以顺利地发展，因此他认为应该从世界已经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摇摇欲坠的角度，来考察和处理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主张不要向德国勒索大量赔款，因为这样会使德国贫困，从而替共产主义在欧洲的传播造成机会。他主张尽量保存德国的领土完整和经济实力，以便使德国起反苏、反共前哨的作用。他狂妄地叫嚣：“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的真正力量，在俄国内部是反革命分子，在俄国以外是恢复德国的秩序和权威。”（《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25年，他代表英国剑桥大学参加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两百周年纪念会，回到英国以后，他写了一本《俄国短论》，极力诋毁苏联。正如列宁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那样，凯恩斯“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这个英国市偿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畸形的狰狞

可怕的东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页。）

凯恩斯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拼凑一套理论，来替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他一生是非常忠实于这个任务的。他一贯从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变动，主张实行通货管理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1923年他写了一本《货币改革论》。他将资本主义的一切弊害归结为货币的不稳定性，因此，他把货币改革问题联系在一个新的主题上——“医治”资本主义的失业，这一主题贯穿在他后期的全部著作中。1926年他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改进”资本主义。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的管理，就可能比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别种制度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经济目的。（《劝说集》）1930年凯恩斯的一部主要著作《货币论》出版了。这本书对货币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坚定地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妄想通过货币调节来达到资本主义无危机的发展。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凯恩斯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是抱着乐观态度的，他认为只要稳定金融和防止货币流通中的紊乱就行了。现在他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1931年他问道：“我们能够挽救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结构的全部崩溃吗？”于是他的注意力就由货币流通转到一个新问题上，即如何防止生产过剩的危机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1933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繁荣的途径》。在这本书中，他一开头就说：如果我们的贫困是由于饥荒、地震或战争，是由于缺少物质资料与资源来发展生产，那么我们除艰苦工作和节约外，别无走向繁荣的途径，事实上我们的困难显然不是这一种。他认为，必须扩大用于个人消费和生产设备上的总开支，来消灭危机现象。他提出的办法是：（一）由政府借债举办公共工程，用来弥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二）实行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增加就业。在这里，他是把扩大社会需求作为挽救资本主义的手段，这是凯恩斯经济观点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凯恩斯在以上著作中的主导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他认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信用紧缩，银根太紧的缘故，所以他主张采取银根松动政策，降低利息率，使资本家借钱方便，从而刺激私人投资；（二）他认为单靠私人投资还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因而提出赤字支出的纲领，即由政府花费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因为政府花费不必象资本家一样，斤斤计较利润，资本家不愿举办的事业，政府应该举办起来，他还认为，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如修建医院、学校、道路、水利工程等来解决失业问题，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因为它会引起一系列的生产活动，结果一人就业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这样就能达到增加社会购买力，制止危机的目的；（三）他提倡奢侈浪费，以此来提高社会的消费需求，他硬说历史上强调节约所造成的灾害比浪费造成的灾害更大。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了。在这本书中，他将以前零星提出的关于防止经济危机的论点，作了系统化的叙述，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现在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的主要部分。所以这本书是凯恩斯的最重要著作，曾经轰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英、美等国，有人认为这是“凯恩斯的革命”，还有人把他比作经济领域里的达尔文或哥白尼。从此以后，他的著作就不多了，除了几篇文章外，只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如何筹措战费》（1940年）。在这本书中，他主张大部分战费应当由劳动人民负担。这里，凯恩斯对待劳动人民的反革命嘴脸，更是跃然纸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全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极力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并且提出了种种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案。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极端尖锐化，他为这些方案披上“充分就业”的外衣，企图用这种诡计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由此看来，我们同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狡猾和最危险的这个流派进行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下一章，我们要揭露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反科学性，然后在第三章中再对凯恩斯“救治”资本主义的方案进行分析批判，以便彻底揭穿他的反动本质。

第二章 虚伪透顶的“就业理论”

一 所谓“有效需求”与就业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失业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关心失业问题呢？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大量失业的存在，阶级斗争的紧张状态，使他感到惶恐不安，他害怕大量失业可能引起革命的爆发。失业大军的存在，一方面对于资产阶级是一种天然的恩惠，它可以用来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廉价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潜在威胁，它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照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忠实奴仆菲力普迈雷的说法：“500万失业者是一个威胁，700万失业者是萧条，1100万失业者是暴动和流血。”当然，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凯恩斯是绝对不赞成完全消灭失业的，他只是渴望找到一个方案，既能把失业大军的人数减少到不致爆发革命的程度，同时又能保证垄断资本的最大限度利润。

凯恩斯认为，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巨大的成功，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则只有相当的成就。他死不承认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崩溃的前夜。他硬说，资本主义还有救，只要经过一些“调整”就可以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防止危机和失业，他认为必需“修正”资产阶级的传统经济理论。于是他大胆提出了一个“有效需求”的原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就是以有效需求作为出发点的，他企图根据这个虚构的原理来解释失业现象，并开出治疗资本主义长年痼疾的药方。

什么叫有效需求呢？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就是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因为资本家经营生产，追求最大的利润，总要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情况。在供给方面，他要考虑供给价格，所谓供给价格是指资本家在经营生产时所付出的生产要素的成本加上他所预期的最低利润。总供给价格就是指社会上全体资本家所有的供给价格的总和。在需求方面，资本家要考虑需求价格，所谓需求价格是指资本家预期社会上用来购买他的商品的价格。总需求价格是指全体资本家预期社会上用来购买全部商品的价格的总和。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要扩大生产，增雇工人。相反，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要压缩生产，减雇工人。只有当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才不扩大生产，也不压缩生产，这时资本家预期的利润达到最大量。在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因为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总需求等于总收入，所以凯恩斯的一般就业理论也就是总需求或总收入理论。他认为，在没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需求一般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而且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都患着需求不足的慢性症，国家愈富强，这种不足就愈严重，结果产生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一般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矛盾现象呢？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去购买所有生产出来的物品。为什么需求不足呢？这是因为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的缘故。

他的基本论点是这样的：就业的数量决定于生产的范围，而生产的范围决定于社会总需求的大小。例如在美国，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标准“充分就业”是每年能生产 2,000 亿美元（按 1944 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的国民财富，但要保证达到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水平，就要有支出 2,000 亿美元的社会需求。社会总需求是由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构成的，这就是说，生产与就业决定于消费与投资的多少。照他的看法，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将增加，但不及收入增加得那么多。因此，要有足够的总需求来支持就业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投资来填补收入与消费间的差额。换句话说，除非投资增加，就业是无法增加的。这就是他所谓有效需求原理的核心。所以凯恩斯理论与其他资产阶级理论不同的主要一点，就是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不一定会产生足够的社会总需求，使得全部生产要素都能充分利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信徒克拉克写道：凯恩斯的“革命”只是发展了一个有效需求的理论，即决定生产总量的水准的理论。这一原理能站得住脚吗？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凯恩斯用供求关系来说明有效需求，然后又用有效需求来说明总就业量。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大众贫困失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总需求不够。他找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花钱太少”，只要政府采取正确政策就能够消除失业现象，好象失业与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关系。但是供求关系能够说明危机和失业吗？马克思写道：“‘**社会需要**’或规定需要原则的东西，本质上要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来规定。”（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89 页。）所以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为了使自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改进技术，采用新式机器，扩大生产规模。随着技术的改进，以生产资料（机器、厂房、原料等等）形式而存在的不变资本部分增长较快；相反地，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增长要慢得多。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变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小。可变资本的比重下降，意味着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减少了，因而失业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相对的人口过剩，即产业后备军。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规律，绝对不是凯恩斯的说教所能掩盖得住的。

其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是主观唯心的。前面讲过，凯恩斯认为，所有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时，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预期出售后要获得多少总收入才合算，另一方面预期社会上将愿出多少总价格来购买。如果前者小于后者，他们将增雇工人，扩充生产；反之，他们将减雇工人，缩减生产。实际就业量决定于两者相等的一点，这时资本家预期社会上用来购买全部商品的总价格就叫做有效需求。非常明显，他把社会就业量的变动归之于资本家心理上的预期，这是一种最庸俗最荒诞的主观唯心论。他把经济的现象看成心理的现象，把客观的事物化为主观的心情，他希望借着这种魔术的作用，将危机和失业的真正原因，从社会制度推向人们的心理，以便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抗性矛盾。当他提出资本家情绪的波动是周期变动的根源时，他极力主张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在于转变资本家的悲观情绪，企图用这种荒唐的论断为保证垄断高额利润的反危机措施提供理论基础。

再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是采取总量分析的方法，即研究社会上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间的均衡，而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要使社会产品实现，社会产品的各部分之间，因而生产的各部门之间，必需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例如在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以及在每一部类的成千成万的分支机构之间，如在棉织品生产与纺织机器生产之间，在机器工业与钢铁工业之间，都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不仅生产领域内的各个部门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在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之间也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建立必要的平衡，否则一环脱节，就可能造成整个锁链的解体，从而引起经济的衰退。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这些比例关系不能不经常遭到破坏。但是凯恩斯却不管这些实现社会再生产所必须具备的比例关系，而片面地认为只要保持足够的社会需求，危机和失业就可以消除了。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话吗？

最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含有明显的内在矛盾。因为他所说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指社会的购买力，然而社会购买力的大小是和就业水平有关的。就业水平高时，社会购买力就大；反之则小，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然而凯恩斯的逻辑是：要保持充分就业就必需有足够的社会购买力来消纳充分就业时所生产的产品，而足够的社会购买力依靠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又依靠社会购买力。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循环论证。

由此看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在以下两节，我们还要对他所谓有效需求的两个构成部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分别进行批判。

二 “消费不足”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性”吗？

依照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说法，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又决定于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那么消费支出的大小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凯恩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是落后于生产的，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较现实的一点。但是他闭口不谈这种情形产生的社会根源，却捏造出来一条“基本心理规律”，企图混淆视听。他说：根据对于人类天性的知识和实际的经验，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一般总是增加消费，不过消费的增加赶不上收入的增加，一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了。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全部销售出去，从而引起生产的收缩和失业的发生。假定把整个社会的收入与消费列成一表如下（单位：亿美元）：

收入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消费	1000	1200	1375	1500	1600
储蓄	0	50	125	250	400

根据上表，凯恩斯说，当社会总收入为 1000 亿美元时，全部收入都用之于消费。当总收入增至 1500 亿美元时，消费只增加到 1375 亿美元，没有花费的 125 亿美元被储蓄起来了。当总收入增至 2000 亿美元时，消费只增加到 1600 亿美元，没有花费的 400 亿美元被储蓄起来了。如果这一部分收入被储蓄后，人们不用之于投资，那么社会需求就要减少，生产就会过剩（生产是 2000 亿美元，而社会需求只有 1600 亿美元），这时候就将有千百万工人失业。这样一来，他就很轻易地将失业的原因归之于社会消费量的不足。而社会消费量的不足，不是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心理规律”的作用。

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的“消费定律”是一个特殊贡献，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头子阿尔文·汉森甚至说它是“划时代的”。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期，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就已经提出了这种思想，在这方面凯恩斯与他们是一丘之貉。所不同的是，旧的消费不足论的前提是：消费的不足是收入缺乏的结果；而新的消费不足论的前提是：人们的收入是充足的，只是没有把它花光。凯恩斯对他的前辈的学说的“修正”，更加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他从根深蒂固的“人性”来说明消费的不足，然后再从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企图用这种无耻的捏造作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论据。对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我们打算从两方面来加以批判：第一，资本主义社

会的消费不足决不是由于“人性”的关系或“心理规律”的作用；第二，消费不足也不是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现在就说明第一个问题。

凯恩斯的“消费定律”——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是从根深蒂固的“人性”引伸出来的。“**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827页。）这就是说，人性并不是超时代的东西，它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一定的阶级社会里，人是在具体的阶级关系中占着一定地位的人，因此人性就得由人们的阶级关系来决定。所以，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但凯恩斯抹煞了人性的阶级性，而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说明消费关系，这是道道地地的唯心史观，凯恩斯的“消费定律”就是建立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所以它是极端虚伪而不符合实际的。

凯恩斯断言：当收入增加时，消费相对地减少，而储蓄相应地增加。但是美国统计材料所表明的恰恰与他的说法相反。

下表表明，从1944-1955年的十二年里，就有六年收入（纳税后的收入）虽然增加，而储蓄反而减少了。例如1955年的收入比1954年增加了146亿美元，储蓄却降低了12亿美元，储蓄对收入的百分比从7.2%下降到6.3%。七十年代也有类似情形。例如1972年的收入比1971年增加了507亿美元，储蓄却降低了55亿美元，储蓄对收入的百分比从10.7%下降到9.3%。这说明“消费定律”根本站不住脚。

收入与消费关系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收入	消费	储蓄
1944	1468	1099	369
1945	1504	1217	237
1946	1592	1466	126
1947	1690	1650	40
1948	1876	1776	100
1949	1882	1806	76
1950	2061	1940	121
1951	2261	2084	177
1952	2367	2183	184
1953	2504	2306	198
1954	2548	2365	183
1955	2694	2523	171
……	……	……	……
1970	6895	6168	727
1971	7444	6649	795
1972	7951	7211	740

凯恩斯捏造这一“消费定律”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凯恩斯从人类本性捏造出一个各阶级所共有的统一的“消费定律”，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阶级差别就被他一笔勾销了。人所共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谈不到工人阶级的消费落后于收入的

增长，而是收入落后于最低生活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不断下降，而剥削阶级所占的份额却不断增长。1889年，美国产业工人工资总额为资本家利润总额的69%，1919年为61%，1929年为48%，1939年为45%。列宁写道：“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对杜马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8页。）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据美国官方规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收入在3988美元以下即所谓“贫困线”以下的人家，便属贫民。美国国情普查局1972年7月公布：1971年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有二千五百六十万，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强。这也就是说，在1971年，大约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被官方正式认为是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加上领取“救济金”人数以及其他贫穷人口，则高达五千多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他们挤在贫民窟和断垣残壁的屋子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人民资本主义”鼓吹者亚尔道夫·亚·贝尔的妻子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描述纽约80个典型家庭的情况时说：他们贫困不堪，疾病迅速蔓延，无法得到医疗，孩子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上学……。十分明显，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绝对不是由于他们的收入增长因而消费相对地降低了，而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被限制在最低水平，实际上他们的消费不是相对的减少，而是绝对的减少了。一般工人的收入连维持最低的生活都不够，还能说他们的储蓄太多了吗？1946年美国产联曾举行全国性的调查。结果证明，它所访问的工人家庭中，有71%的家庭，储蓄额不到300美元，有许多家庭简直什么存款也没有。美国的官方统计尽管煞费心机，打了不少折扣，但也掩盖不了这一重大事实。联邦储备银行在1951年1月到3月间的储蓄调查表明：在美国，40%的家庭根本没有任何储蓄，30%的家庭只占储蓄总额的9%，10%薪金收入较高的家庭占9%，而20%的上层家庭则占有所有储蓄总额的82%，其中10%的最上层家庭占有储蓄总额的65%。换句话说，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占有储蓄总额的三分之二。这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和增强竞争实力，必然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凯恩斯的消费定律，在一定条件下，似乎也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而不适用于工人阶级。甚至一位资产阶级的学者吉尔贝也说：“并无明显的事实证明，消费的心理规律乃是一个人性的基本规律。……凯恩斯似乎是提出一条定理，它只是在一定时期适用于一定的集团，而不能成为一般的心理规律，可以在一切时期用来描述一切人的行动。”凯恩斯企图抹煞阶级的差别，把资本家的利润收入和一般职工的工资混为一谈，把工人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的消费混为一谈，而使用一些暧昧的名词（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以掩盖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这种手段是相当毒辣的。

以上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不足，并不在于什么根深蒂固的“人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事实也完全驳倒了凯恩斯的“消费定律”。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二个问题：消费不足是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吗？

凯恩斯企图从人们的心理特征引出一条“消费定律”，然后根据这一虚构的定律辩称：收入愈大，则储蓄愈多，于是社会愈富，则收入与消费间的差额也愈大，以此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带有更大危机倾向的理由。凯恩斯不承认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却把它归罪于消费不足。对这种浅陋的“消费不足论”，我们只要指出两点就够了。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危机是紧跟着经济的高涨时期，那时就业达到相对的最高水平，工资也会有所提高。那末，既然工资提高了，消费增加了，为什么反而会爆发危机呢？

第二，危机和萧条时期失业人数激增，因而消费水平是最低的。为什么这时的低消费水平并不影响周期上升阶段经济的复苏呢？

此外，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是自人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后就发生了，但经济危机却是在资本主义出现后才爆发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每年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变得明显，……”（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326页。）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不足是一个事实，但不能用来解释危机。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矛盾的事实、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种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的地位，并且看做只是和资本主义总生产的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3页。）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不过是这一基本矛盾的一种主要表现罢了。所以凯恩斯的“消费不足论”是非科学的。

三 “投资不足” 是因为利润太低吗？

从凯恩斯的立场来看，失业的产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消费太低，解决的办法是多消费。但他也了解，在贫富两极化的社会里，扩大剥削阶级的寄生性消费，无异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他对于增加消费的作用不太乐观。因此他又建议采用刺激投资的办法来扩大社会需求。他硬说，假如可能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弥补消费的不足，从而提高生产，增加就业，则消费不足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危害。他还指责旧的消费不足派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忽略了扩大生产的另一个途径—增加投资。他认为，增加生产和促进就业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即增加投资和提高消费同时并进。他强调说：他的就业理论和经济纲领的重点，是建筑在投资需求方面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就业通论》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理论可以概括地说，在一定的社会心理下，整个生产和就业的水准，决定于投资总量。”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投资的情况是怎样呢？

在十九世纪时固定资本差不多一直是在逐渐增长的，但是并没有挽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命运，差不多每隔八年至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危机。而每次危机都大大扩充了失业大军的队伍。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增长率才不断下降：从十九世纪末期每年平均增长5%强降低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平均每年增长4.3%，第二个十年每年为3%，第三个十年每年为2.5%，第四个十年每年为0.1%。资本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照凯恩斯的意见，是由于投资动机的衰退，他说，投资决定于资本家有没有获得利润的希望，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利润率与利息率。如果利润率大于利息率，资本家就进行投资，反之就不投资。他由此推断说，投资的衰减是由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这就是说，投资不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利息率虽然下降，但不及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大。他企图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相对关系来说明投资的不足，然后从投资不足来说明危机和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投资不足是

否因为利润率太低引起的?第二,危机和失业的产生是否由于投资的不足?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别来加以考察。

不错,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使一般利润率下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利润率却显示出相当的稳定性,见“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统计表”。

这一时期利润率的稳定,是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阻止了它的下降,如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机器原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日趋低廉、不变资本的节省和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等。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利润率急剧地增长起来。例如美国加工工业的利润率从1949年的18.5%增长到1951年的27.9%。至于利润量,那就增长得更加惊人了。从“美国公司利润的增长”表可以看出,凯恩斯所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很低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统计表(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全部资本总额	剩余价值	利润率
1919	70.44	8.23	11.7
1921	58.45	5.70	9.8
1923	70.96	8.40	11.9
1925	73.82	9.10	12.3
1927	72.30	9.50	13.1
1929	77.28	11.50	14.9
1931	55.70	7.00	12.6
1933	47.10	5.30	11.2
1935	58.15	6.60	11.3
1937	70.55	8.80	12.5
1939	67.95	9.90	13.4

美国公司利润的增长

(以1940-1949年为100)(单位:百万美元)

	1931-1939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纳税前的年平均增长利润	3408	24356	43120	67470
指数	14	100	173	277

讲到利息率,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人都知道,借贷利息是产业资本家因取得贷款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所以通常利息率不会超过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利润率的限度内,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率是相当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增长,他们对于组织生产愈来愈不感兴趣,而宁愿做一个靠利息为生的食利者,于是借贷资本的供给不断增加;可是另一方面,现有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借贷资本的供给经常超过需要,因而造成了利息率下降的趋势。

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短期借贷的利息 1866-1880 年为 3.6 厘（最低率）至 17 厘（最高率），1881-1900 年为 2.63 厘至 9.75 厘，1901-1920 年为 2.98 厘至 8 厘，1921-1935 年为 0.75 厘至 7.81 厘，1945-1956 年为 0.75 厘至 3.63 厘。

根据上述情况，难道说利息率下降的程度小于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吗？

一方面垄断利润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利息率不断下降，于是借贷利息在全部利润中所占比重也就日益减少。据美国商业部调查，美国大型与中型制造厂商中，所付利息占利润（纳税及付息前）10% 以上者，1927 年有 40%，而到 1951 年只有不到 6% 了。如果就全部美国公司（包括公用事业在内）来讲，所付利息占收益（纳税及付息前）的比重，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是 3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 12%，而在 1952 年则只有 8% 了。

根据凯恩斯的说法，投资决定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只要利润率高于利息率，资本家便会进行投资，直到利润率与利息率相等时为止。现在利润率比利息率要好几倍，为什么资本家反而不肯投资了呢？事实上，投资并不决定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它完全决定于现有的利润水平。马克思写道：“**决定生产的扩大或缩小的，是无酬劳动的占有，是这个无酬劳动对物质化劳动一般的比率，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利润和这个利润对所用资本的比率，因此，也就是利润率的一定水准，而不是生产对社会需要，对已经在社会中发展的人类需要的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82 页。）在帝国主义阶段，投资决定于最大限度利润。其原因有三：第一，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为实现经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不是平均利润，不是超额利润，而是垄断高额利润**。第二，垄断组织间的竞争已经变成消灭竞争对手来建立个别垄断组织霸权的残酷斗争，要达到这个目的，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也都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垄断组织如果不能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利润，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更谈不到打倒竞争的对手了。第三，由于垄断资本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的加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部门结构的变化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间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刺激，固定资本的贬值和消耗急剧增长，必须依靠垄断高额利润来弥补。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不能保证垄断高额利润，资本家是不愿意进行投资的。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就利用自己的强大势力来阻止资本流入垄断化的生产部门，而自己也不肯继续投资扩大生产，以免生产增加，价格下跌。因此垄断资本的统治才是投资受到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帝国主义时期，企业的长期开工不足则是阻止资本家继续投资的新因素。所有这些情况都阻碍了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投资衰退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巨额军事订货和以军事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技术发展，由于美国政府加紧推行的加速折旧、减免新设备投资税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以及垄断组织追逐高额利润的剧烈竞争，所以美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凯恩斯对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闭口不谈，却想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对比关系来说明资本家投资的动机，并从利润率的低落来说明投资的衰退。世界上除掉丧失了任何现实感的人还有谁敢于说这样大胆的谎言呢？凯恩斯还认为造成危机和失业的原因就是由于投资不足，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凯恩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提出了极其荒谬的论点。他说：当资本家对资本的未来收益作乐观的估计时，预期利润率提高，于是投资增加，因而便形成了周期的上升阶段；相反的，当资本家对资本的未来收益作悲观的估计时，预期利润率下降，于是投资停止，社会需求缩减，结果便形成危机。这是一种最庸俗的“投资不足论”，其荒诞无稽是显而易见的。危机的经验表明：造成危机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投资不足，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消费基础相对狭小的矛盾所引起的相对于社会消费能力的投资过多。当商品充斥市场，企业开工不足，原料堆积如山时，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资本缺乏，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投资的周期变动，是决定

于再生产的条件。当经济高涨时，物价上涨，利润增加，在这种具体条件下，资本家自然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相反的，当经济衰退时，利润减少，资本家看到情形不妙，因而停止投资，收缩生产。

从下表可以看出，在危机期间，固定资本投资额一般都是下降的。很明显，投资减少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所以凯恩斯的“投资不足论”是倒果为因的。

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固定资本投资的变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固定资本投资	增减率%
1929	106	>-77.4
1933	24	
1937	73	>-26.1
1938	54	
1948	269	>-6.7
1949	251	
1953	342	>-1.8
1954	336	
1957	464	>-10.3
1958	416	
1960	434	>-2.9
1961	470	

注：固定资本包括耐用生产设备和住宅以外的新建筑。

因此，凯恩斯主张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制止危机，这是非常矛盾的。这等于说：如果纺织品生产过剩，就多投资制造一些纺织机器吧；如果汽车、冰箱卖不掉，就多投资生产一些钢铁吧！他把消费和投资看成各自独立的两个因素，好象投资可以不依赖消费而独立发展，只要投资增加，就可以万事大吉。他完全抹煞了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问题。事实上，在市场商品充斥和销路停滞的情形下，哪个清醒的资本家愿意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呢？

凯恩斯企图用“投资不足”来混淆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以便论证他的主要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靠调整投资来克服危机的可能性。他所说的投资，主要是指资本家对厂房、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支出，他认为，当经济危机爆发或生产衰退时，增加投资有着药到病除的作用。照他的看法，新增加的投资支出，成为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人们的收入，这一部分人按照当时的消费习惯，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消费，成为生产消费品部门的收入。生产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家和工人又按照当时消费习惯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从而进一步引起从事消费品生产的人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又引起他们消费的增加。消费这样继续扩展下去，就会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长，这比最初投资产生的收入和就业要大好几倍。人们从其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那么这个“倍数”也越高，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额也越大；如果将这种收入全部用于消费，那么这个“倍数”就会大到无限，收入和就业也将增加又增加，一直到充分就业。这就是他所吹嘘的“倍数原理”。

“倍数”的神话并不是凯恩斯发明的。早在1931年，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甘恩在《国内投资和就业的关系》一篇论文中，就曾经提到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所起的倍数作用。到了1933年，凯恩斯接受了甘恩的观点，在《繁荣的途径》一书里用“倍数原理”来分析公共工程的支出及其效果问题。现在他又强调说，在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如果政府决定修筑公路、兴建学校或扩充军

备，都会引起收入波浪式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收入从而消费的不断增长，又会引起生产从而就业波浪式的扩大。于是这个奇妙的“倍数原理”就成为他的就业理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倍数原理”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新投资所引起的生产扩大过程，从而抹煞了资本主义矛盾为生产扩大所造成的界限。因为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对付生产过剩危机，必然使危机期间无法在物质形式上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这就会延缓生产同消费之间平衡关系的重新建立，因而现有矛盾也无法获得暂时强制的解决。相反的，由于投资的增加，生产能力更加增长了，这就使生产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空前尖锐的程度。矛盾的尖锐化自然不会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得到解脱，而只能使危机越来越加深。所以，凯恩斯认为新投资会引起漫无边际和毫无阻碍的生产扩大，这简直是幻想。

其次，“倍数原理”的基本前提是“斯密教条”，它忽视了不变资本。斯密错误地认为商品价值最后全部分解为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而不包括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因为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也是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凯恩斯的“倍数理论”就是建筑在这一错误的信条的基础上的。他硬说，一笔新投资会全部变成人们的收入，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依一定的比例增加，这一部分消费的支出又会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如此往复循环，就会形成一系列收入的膨胀过程。在这里，他也完全撇开了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部分。事实上，每一笔投资都必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作为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提供收入增加就业的只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部分不能成为人们现在的收入，因而也不能影响消费和消费品的生产。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政府增加一亿元用来购买军火，照凯恩斯看来，这一亿元全部成为军火工厂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他们的消费也要增加，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军火工厂为了扩充生产，除了拿一部分钱增雇工人外，还要拿大部分钱去购买机器原料，而购买机器原料的钱，既不能成为军火工厂的资本家的收入，也不能成为生产机器原料的资本家的利润和职工的工资，因为他们的收入早已到手也早已花费了。对生产机器原料的资本家来说，机器原料的出售，并没有引起收入的增加，而只是引起资本的变形，即由商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很明显，政府投资花费的钱不可能全部变为人们的收入，它所直接增加的就业和创造的收入，只限于它所分解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凯恩斯根据“斯密教条”所提出来的“倍数原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凯恩斯的“倍数理论”之所以荒谬，也与他抽掉了时间因素抽象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有关。就时间来讲，他所说的投资效果不是短期实现的东西，自新的投资引起第一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到第二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再到第三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以至于最后一次收入与消费的增加，需要经过无限长的时期，我们不能把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做一种短期的效果来理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一般说来，新投资总是在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下进行，因而投资增加时，往往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造成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所以投资的增加，决不会象凯恩斯所描绘的那样，就会引起就业的巨大增长，有时投资增加，失业也增加了。例如，战后美国投资的支出，曾由1945年的87亿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221亿美元，然而，在这一时期内就业人数却缩减了。仅官方登记的完全失业的人数，就由1945年的64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285万人。哪里有什么投资支出的倍数作用呢？

最后，凯恩斯的“倍数原理”是根据一种形式逻辑的推论，而这种形式逻辑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不相符合的。譬如说，政府的投资变为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于是消费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消费可能靠现有的商品储备来满足，而毋须扩大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政府投资的膨胀作用，可能在这一阶段就停止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加深时期，过剩商品经常堆积如山，例如1971年6月30日美国零售商存货量为475亿美元，批发商存货量为274亿美元。由于大量过

剩商品的存在，政府投资即使引起消费的增长，它也只能减少一些存货，而不会象凯恩斯所幻想的那样，收入和消费不断增加，生产和就业也就不断扩大，结果“一个比较小的投资增加量，就会引起充分就业”。这完全是空中楼阁。

总之，凯恩斯的“倍数原理”是非常荒诞无稽的，它既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不能制止危机的发展。

综上所述，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危机和失业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投资的不足。投资的不足是由于利润率太低。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批判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投资不足不是由于利润率太低，而是垄断统治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结果；（二）“投资不足”的危机论是倒果为因，把经济变动所制约的派生因素看作是经济变动的决定性力量；（三）他企图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防止危机，其结果是加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

四 利息是“心理现象”吗？

我们曾经指出，国家调节投资是凯恩斯经济纲领的核心。照他的说法，投资的大小，取决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只有利息率降低到利润率以下，资本家才肯进行投资，从长期来看，利润率是趋于下降的，但利息率却不会相应地跌落，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利息率的变动要受“灵活偏好”的心理规律的制约。关于利息问题，他并不首先确定利息的真正性质，也不想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中去探讨利息的来源，却想混淆视听，将利息说成是心理现象。

究竟凯恩斯怎样捏造事实将利息说成是心理上的问题，就先要了解他所谓“灵活偏好”是什么东西。

关于人们的收入，凯恩斯认为要做两个心理上的决定：第一，收入中多少要用之于现在消费，多少要储蓄起来；第二，储蓄份额确定后，又要决定用什么形式来保持储蓄——用现金的形式还是债券的形式。在这里，最荒诞的“灵活偏好”便插足进来了。他说，关于第一点消费与储蓄的划分，是由消费倾向来决定的，至于第二点储蓄如何保持，这就要看人们的“灵活偏好”了，所谓“灵活偏好”是指人们要以现金形式来保持财富的愿望。但持有货币（现金）就得不到利息，假使换取债券，就可得到利息，那末，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持有货币呢？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需求货币呢？他认为，这是因为货币是大家所接受的交易媒介，具有流动性，周转灵活，可以用作种种开支，可以用来应付紧急需要，也可以用来满足投机的动机。在凯恩斯的利息理论中，他特别强调这种投机动机。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凯恩斯的庸俗观点。当一种债券的利息率为 3% 时，一个人打算用 1,000 美元来购买这种债券，每年获得 30 美元利息收入。但是当他预测市场利息率不久会上涨到 4% 时，他就踌躇不前了，因为那时债券价格大约要跌到 750 美元，这意味着，凡是用 1,000 美元来购买这种债券的人，实际上要损失 250 美元（减去这段时间内获得的利息），他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如果市场上一批投机者认为利息率将来可能上涨，他们就宁愿保持现金而不去购买生息的债券。这样，市场现金供应缺少，银根吃紧，利息率就要上涨。反之，如果这一批投机者预期市场利息率会下跌，债券价格会上涨，他们就不愿保持现金而去购买债券，结果银根松动，利息率就要跌落。于是凯恩斯断言，这种“灵活偏好”同利息率的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所谓“灵活偏好”的心理规律就是说，在一定的货币总供给量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的总需求，而货币的总需求又决定于人们保有现金的愿望——“灵活偏好”。这样一来，利息率又是决定于一定的心理状态，即人们想以货币（现金）形式保持财富的心理动机了。他认为，如果一般人保持现金的愿望很大，

因而人们愿意保持现金的数额（需求）大于现有货币数量（供给），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利息率就要上升，只有相当高的利息，才会引诱一些人们放弃现金。反之，一般人保持现金的愿望很小，因而人们愿意保持现金的数额小于现有货币数量，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利息率就要下降。它最后将停留在一点，在这一点上保持一定数量现金的愿望刚好被利息率的引诱力所抵销，使得货币的供求趋于平衡。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利息的大小，是由人们的心理动机来决定的，“利息率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现象”，它不是“等待”或“储蓄”的报酬，有如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指英国以马歇尔·皮古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派）所说的那样，而是在“一定时期内放弃灵活性的报酬”，也即是放弃保持现金的报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诡辩方法。任何人都知道，在商品社会里，货币的需要量，是由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所要实现的价格总额来决定的。所谓“灵活偏好”纯粹是无稽之谈。利息率决定于“灵活偏好”状态和货币数量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全套把戏在于迷惑读者，歪曲利息的实质。但是它的虚伪性是很显然的。凯恩斯说，利息本身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放弃灵活性的报酬，这就将利息的产生说成是物自体的一种属性，货币能从自身中生出货币来，正如种瓜得瓜一样地自然。但是，我们不免要问：放弃灵活性为什么就会生出利息来呢？难道货币的灵活性也和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吗？这些问题，他就不敢进一步去分析了，他并不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探求利息的来源，他也不想知道，利息是货币资本的报酬，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产生的。可是我们知道，资本家借得货币是为了靠这一资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非常明显，利息是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由产业资本家分润给货币资本家的。因此，离开了生产关系就无法说明利息的来源，也不能理解利息率的决定力量。然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却撇开生产关系而大谈其心理动机，他企图玩弄心理把戏，来粉饰资本主义而遮盖其剥削掠夺的本质。这种辩护意图是与臭名昭著的“节欲说”和“等待说”同样反动的。

凯恩斯捏造“灵活偏好”的利息理论，把利息说成是心理现象，他的目的是：（一）进一步掩盖危机和失业的真实原因；（二）为实行他大力鼓吹的赤字财政政策制造借口。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和失业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投资动机的衰退。而投资动机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借贷利息没有随着利润率相应地下降，借贷利息之所以没有相应地下降，是由于政府通过货币数量的控制来操纵利息率有一个限度。当货币数量增加太多，以致人们对于未来发生疑惧时，他们就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买进债券，于是一般的“灵活偏好”发生变动。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再增加货币，也不能降低利息率。这样一来，他就将政府靠金融政策来“消除”危机和失业的困难归之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即人们持有现金的愿望加强了。因此他断言，金融政策往往收效不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这就是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补偿”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之不足。在“反危机”措施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赤字财政政策，这是他不同于以往庸俗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一点。

总起来讲，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这就是说，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决定于消费和投资的大小。工人失业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结果。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消费者对于消费的心理倾向，这是第一个基本心理规律。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利润率和利息率失调所引起的，利润率决定于产业资本家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这是第二个基本心理规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资本家对于灵活性的心理态度，这是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凯恩斯的全部就业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上面的。在他看来，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就是受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决定的有效需求的限制，他企图根据这种庸俗荒诞的主观唯心论建议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话吗？

五 凯恩斯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蓬勃发展，而帝国主义经济停滞，危机四伏，各种基本矛盾日趋激烈。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垄断资本家的御用学者又杜撰了一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他们妄图以“稳定发展”或“均衡发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经济增长论”。这一庸俗理论实质上是凯恩斯理论的“新发展”。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短期的静态的理论。他从社会结构、生产技术和工人数量不变的前提出发，分析那些决定现有工业设备利用程度的因素，企图通过这些因素的控制来消灭危机和失业。这自然是一种幻想。现在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凯恩斯的静态分析同现实完全脱节，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主张用投资来填补收入和消费间的差额，但是随着投资的增加，生产能力也扩大了，这时有效需求若不增加，生产设备就不能充分利用，结果投资率将会下降。随着投资的下降，收入和就业也将减少。由于投资具有“两重性”，它既能增加需求，同时也会扩大生产能力，必须使这扩大了的生产能力也得到充分利用，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凯恩斯只注意投资在增加需求方面的作用，却忽视了投资在增加供给方面的影响。纵使照他的想法，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达到短期的充分就业均衡，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他的一些信徒就极力为反科学的凯恩斯主义作修漏补缺的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方面，即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趋势的分析，把凯恩斯的静态分析扩展为动态的分析。他们妄想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消灭”危机和失业，而且可以不断地稳定地发展。他们企图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矛盾，而从资本积累（储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加等因素来探索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把生产和收入不断增长的条件加以公式化，从而把政府的调节政策放在比较长期的基础上。“经济增长论”就是这一“发展”的产物，它有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趋势。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庸俗经济学家有卡莱琪、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逊和杜玛等人。他们都对经济动态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编造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哈罗德模型”或“哈罗德—杜玛模型”。哈罗德是英国人，早在1939年，他就发表了《论动态理论》一文，正式提出经济增长的观点，1948年他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写成一本书，题为《动态经济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着重研究了三个问题：（一）假设生产与设备一开始是平衡的，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平衡随着时间的进展仍将保持下去，换句话说，国民经济要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才可以避免膨胀和萧条；（二）如果实际的增长率大于或小于必要的增长率，经济体系内有没有一种力量使两者趋于相等；（三）如果必要的增长率获得实现，它能够自动保持下去吗？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他把经济增长率分为三种，即“实际增长率”（用G来表示）、“有保证的增长率”（用GW来表示）和“自然增长率”（用GN来表示）。他想通过这三种增长率的比较来断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关系，为政府制订长期补偿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哈罗德首先考察了G和GW之间的关系。据他说，GW就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增长率，它意味着从整体来看资本家对其生产和投资计划是感到满意的，因为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恰好等于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的需要恰好等于储蓄的供给（指资本积累），所以国民经济可以保证按照这个速度向前发展。他又说，如果G大于GW，那末，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就大于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

的需要量超过储蓄的供应量，于是资本家感到生产设备不足，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订货增加，投资扩大，经济趋向繁荣。相反的，如果 G 小于 GW ，那末，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就要小于生产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的需要量少于储蓄的供应量，于是出现生产设备过剩现象，因而资本家订货减少，投资下降，经济趋向萧条。他认为，“甚至在想象得到的最理想条件下，由于季节或偶然性的原因，‘实际增长率’也常会与‘有保证的增长率’脱节。”如果两者发生不一致的情形，就会产生愈益背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哈罗德从 G 和 GW 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这是一种最庸俗最荒诞的危机理论。因为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什么 G 和 GW 的背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以及由这个矛盾所决定的生产日益扩大的倾向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就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于是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又不断地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于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小。因此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证，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一切谬论，它告诉我们，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经济危机就是无法避免的。

还应指出，哈罗德的危机理论也是极端唯心的。他假定：（一）现有生产设备充分利用；（二）消费量的增加乃是引起新投资的唯一因素。他根据这些前提假定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建立综合模型，进行逻辑推论。然而现实生活表明，战后许多国家经过不同形式的斗争，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控制，赢得了独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了。同时国内市场的问题，也愈来愈尖锐化，因此，企业开工不足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哪里还谈得上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以美国为例，工业生产设备利用率一般只有80%。至于投资，它不是完全以当前消费为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一定是为了应付消费品生产的当前需要。资本家可能投资生产新式的机器或改良的原料，用来开辟新的市场。列宁写道：

“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各种矛盾相适应的矛盾。”（《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因此，哈罗德的前提假定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从这种前提假定引伸出来的危机理论自然也是虚构的、反科学的，完全脱离实际。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也说，哈罗德的模型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

哈罗德不仅捏造了“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并从两者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他还捏造了一个“自然增长率”，并从“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增长率就是国民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它是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的增长率。譬如说，假定每年人口增长1.5%，劳动生产率提高2%，那末国民收入每年就可能

增加 3.5%。照他的想法，GN 可能和 GW 相等，然而这只是偶然的，因为经济体系内没有一种力量会使两者必然趋于一致。如果 GW 大于 GN，它意味着资本积累快于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由于劳动力缺乏而发生生产设备过剩现象：于是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出现慢性的萧条。反之，当 GN 大于 GW 时，资本积累相对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所必需的资本来说是不够的，劳动力显得过多而且相对地低廉，于是利润率上升，投资引诱加强，经济出现长期的繁荣。据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不稳定性的原因。

显而易见，哈罗德的这一论断也是荒谬透顶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死亡的必然性，是它的内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断地尖锐化，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腐朽性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就是一个铁证。当然，这种不稳定性和腐朽性并不意味着生产技术的完全停滞。但是技术的进步，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加速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旧制度的毁灭。

以上说明，哈罗德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企图把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函数关系，用形式主义的数学游戏来代替生产关系的本质研究。他从 G 和 GW 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又从 GN 和 GW 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美国杜玛分析经济扩展过程，得出与哈罗德相似的结论，这就是，要使经济稳定增长或均衡发展，国民收入和投资必须按一定的速度增长。所以“哈罗德模型”又叫作“哈罗德—杜玛模型”。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增长论”在资本主义各国之所以如此泛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庸俗理论是为垄断资本加紧对内剥削、拼命对外扩张服务的。在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它切合垄断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

第一，“经济增长论”是垄断资本疯狂地进攻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按照这个“理论”，好象资本主义经济还能够稳定地向前发展，问题在于控制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只要对这些基本因素进行适当调整，资本主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过多，因而资本需要量也要越来越大，国民经济才能均衡发展，这就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勇敢地担负起保证足够投资的责任。哈罗德等的政策建议是降低利息、减少赋税、加速折旧……。一句话，就是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器溶为一体，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以保证垄断资本的最大限度利润。

第二，这种“增长论”也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效劳的。他们极力掩盖被压迫民族之所以经济落后的真正原因，硬说“不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而在于人口太多，资本太少，因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充分利用外资，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且，随着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就会有知识和技术在国际间的交流，从而满足“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和技术的需要。他们妄图用这一套伪善的说教来麻痹正在维护和争取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意志，解除它们的思想武装，从而加强殖民主义的统治。

第三，“经济增长论”的矛头也是针对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凯恩斯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感到十分惊恐，因而妄想依靠他们的理论模型来谋求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使资本主义得以“万世长存”。杜玛说：“现在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得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这句话充分暴露了“经济增长论”的反动实质。

以上我们说明了战后时期一些凯恩斯分子对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发展——“经济增长论”，并揭露了这一庸俗理论的极端虚伪性和反动性。此外，凯恩斯分子们的“新理论”还有：（一）以汉森为代表的“长期停滞论”，他们绕过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而从人口增长率降低、技术发展缓慢和新领域开发停止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现象；（二）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景气变动论”，他们抹煞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从投资引起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又引起投资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震荡过程；（三）以杜森贝为代表的“消费函数论”，他们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从周期变动、消费习惯和每个人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稳定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作用。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货色都是在“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幌子下，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它们的中心论题只有一个，就是鼓吹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反动性增强了。在下一章我们要探讨一下凯恩斯理论的实际影响，以便进一步认识这一庸俗理论所起的反动作用。

第三章 凯恩斯的救治方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凯恩斯的全部就业理论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完全出于无耻的捏造。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教授（指资产阶级的——引者注）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凯恩斯为什么要用这种欺骗手段，故弄玄虚大发谬论呢？目的很清楚，就是企图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证明资本主义的前景还是十分美妙的，只要国家干涉经济，资本主义就可以成为尽善尽美的制度了。在他看来，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又分为两部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能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制度，而且国家愈富，“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情形就愈严重。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行动，干涉经济生活来消灭经济危机和失业。他写道：政府职能的扩大，以便负起责任来提高消费的能力与促进投资的活动，这是避免现行经济形态整个毁灭的唯一途径。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

从这一幻想出发，凯恩斯提出了一套经济纲领，作为对付危机和失业的“新”方案。这一套纲领强调依靠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直接干预，而这一点，正是同庸俗经济学派显著的不同之处。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传统一般认为，只有听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运行。而凯恩斯及其信徒，一贯鼓吹扩大资产阶级政府的职能，以便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更广泛和更直接的干预。正由于凯恩斯分子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并为之制造出“理论”依据，因而凯恩斯主义时常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概括说来，有以下三项：（一）通过赋税政策，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二）加强通货管理以降低利息，刺激新的投资；（三）“投资社会化”，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管理私人投资以限制私人投资的波动；利用公共投资以增加经济活动和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前一项纲领在于提高消费，后两项纲领在于增加投资。除此以外，他还主张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以便转嫁危机和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这一套纲领行得通吗？我们倒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一 赋税政策与收入再分配

在铁的事实面前，凯恩斯不得不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即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太不平均。他认为，消费支出的不足，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的趋向所造成的。因为，如果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交给那些需要已经得到充分满足的人，他们只会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结果就造成商品的滞销和失业的增长。所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他们会把收入大量花掉，这样便能提高消费的支出，扩大社会需求的总量。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主张，即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幅度，以增加消费和提高就业水平。

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凯恩斯提出赋税政策的目的，果真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吗？赋税政策到底能否实现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呢？这是问题的中心。

首先应该指出，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处理财富及收入的分配问题，那是欺人之谈。马克思写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国民收入的分配必然服从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使其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企图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消灭收入不均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凯恩斯宣扬的所谓收入再分配，完全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非常明显，赋税政策不能改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分配关系，相反的，它只能引起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税收制度的社会性质和实际效果，完全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国家政权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税收制度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英、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税收政策便是有力的证明。例如美国在1789—1945年的156年当中，联邦政府一共征收了2,540亿美元的税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年（1946—1953年）当中，政府就向居民征收了3,920亿美元，即比以前156年所收的税款总额还要多1,380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从1940年至1970年30年间，美国的赋税增加了近16倍，即从1940年的165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2,78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分摊，1948年每人负担377美元，到1970年已增加到1,500美元，在22年中增加了3倍。同时，赋税的重担也越来越多地转嫁到收入最低的劳动人民身上。这可以用下列资料来说明。

美国政府的税收及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单位：亿美元）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总额	占国民 收入%	总额	占国民 收入%	总额	占国民 收入%	总额	占国民 收入%
联邦税	84	10	490	20	940	23	1890	24
州及地 方税	81	10	160	7	370	9	890	11
合计	165	20	650	27	1310	32	2780	35

从美国税收的具体项目来看，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几乎五分之四来自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和消费税。这三项税收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职工负担的，而公司所得税仅占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最近几年下降到六分之一左右。

如果考虑到农民及其他劳动者所缴纳的各种赋税，那就更能明显地看出美国的税收已经成为掠夺广大居民阶层的工具了。

现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利用凯恩斯主义这一虚伪的纲领进行投机活动，大力宣传通过税收达到“收入均等”，并通过“收入均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赋税的社会主义”。但是右翼工党分子的实践，正好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标榜的所谓“赋税的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反驳。英国工党在执政期间非但没有把税收负担加以比较公平地分配，反而大大增加了工人和职员의捐税负担。例如英国工人的所得税从1938年的200万英镑增加到1950-1951年度的21,200万英镑，即增加了105倍，而资产阶级集团的所得税在同一时期却只增加了不到3倍。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不断加重，而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在增长。不仅如此，工党政府还把战时抽100%的超额利润税减低到80%，一年后又减低到60%。这表明工党的“社会主义”纯粹是替垄断组织服务的伪装。

上述资料彻底揭穿了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利用赋税政策“公平地分配收入”的谬论。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硬说，近二、三十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似乎是比较平均了，甚至胡说什么“收入革命”。关于所谓“收入革命”的论调，我们毋须多费笔墨来详加评论，事实是不难看到的，这里就有一个关于美国各种形式收入变动的统计：

美国各种形式收入的变动（以1929年为100）

收入的形式	1940年	1945年	1955年	1967年
未纳税前公司利润	97	197	456	798
私人企业中的公司和薪金	91	182	381	741
农民收入	77	198	183	279

上表证明：在1929-1967年期间，公司利润增加了7倍，私人企业中的工资和薪金总额只增加了6.4倍，农民收入只增加了1.8倍。所以在国民收入中，资本家所占的份额上升了，而工人和农民所占的份额则下降了。近一、二十年来，美国贫富两极化的情形更加严重。据美国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资料，1970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40%以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家庭约只占全部社会财富的3%左右。另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詹姆斯·史密斯研究估计，在美国成年人中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一万亿美元财富，占全国私人资产的25%以上。从股票掌握的情况来看，剑桥研究院的乌赖和利安两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在1962年，20%的富翁拥有全部公司股票的97%，而其中最富有的1%的大富翁则掌握全部公司股票的62%。美国《商业周

刊》指出：“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在最富和最穷的美国人之间距离正在继续扩大。”《纽约时报》也说：“在美国，收入的分配存在着惊人的持续的不均状况，而这些状况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

就英国来讲，从1946-1950年工党执政期间，资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32%增加到35%（税收除外，没有分配的利润计算在内），而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却从47%降低到43%。

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完全推翻了所谓“收入革命”或“公平分配收入”的蛊惑宣传。列宁早已揭露了“公平分配收入”的虚伪性。他写道：“**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偿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页。）

当然，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环绕分配问题所进行的叫嚣，与蒲鲁东式的幻想是不同的，他们所着重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十多年前，美国两个经济学家合写了一本叫《资本家宣言》的书，提出一种骇人听闻的怪论。他们说：造成美国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而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性是由于工人阶级“掠夺和剥削了”资本家，一部分理应属于资本家的财富，却落到工人的腰包里去了。因此他们号召来一次“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形式的革命”。这种赤裸裸的宣传品，道破了一切垄断资本辩护士关于收入再分配的实质。

还应指出，凯恩斯分子在谈到赋税制度的演变时，还极力吹嘘它的“稳定”作用，说什么美国通过长期的税制改革，赋税已成为极重要的“自动稳定器”，这种“自动稳定器”是反商业循环的有力武器。由于现在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占到联邦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而所得税的收入是随国民收入的上升而自动增加，随它的下降而自动减少，这就使国民收入的循环性下降对于社会总支出的影响减少了，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保持长久的稳定。美国经济学会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我们对1949年联邦财政制度的稳定作用可作如下的总结：在没有国会或行政首领的抵销行动下，国民收入每降低100亿元，税收就会随之下降约30亿元，……同样，国民收入每上升100亿元，税收就会随之增加约30亿元……许多经济学者认为，自动调节器的进一步扩大是可能的，而且是好的。”

尽管不少凯恩斯分子大肆宣扬赋税的稳定作用，但是实际生活表明，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赋税的日益增加而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了。在现实的打击之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供认，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有限，不足以“熨平”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方面来了。

二 金融政策与工资政策

凯恩斯的经济纲领是着重在投资方面的。为了刺激私人投资，他主张政府增加货币数量、降低利息，并坚定地认为低利政策是刺激投资和防止失业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写到：“设货币可以象农作物一样生长，或象汽车一样制造，则不景气可以避免或减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增加货币数量就可以降低利息率吗？降低利息率就可以刺激投资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曾经指出，利息率的水平并不决定于货币数量，而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特别是由现行利润率的高低来决定的。因为利息本身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在通常条件下，借贷

资本的利息率不能超过平均利润率，否则向别人借用资本就失掉任何意义了。凯恩斯用货币的范畴代替了借贷资本的范畴，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货币数量对于利息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论断是反科学的。事实上，借贷资本和货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借贷资本不但与正在流通中的货币不同，而且是独立存在的；社会上货币数量的增减和借贷资本的增减，未必有直接的联系。假如一万元货币由甲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与乙，乙把此款借与丙，而丙又把此款存入银行，然后再由银行贷与丁，如果在一日之间，这样反复贷放五次，那末一万元的货币便能产生五万元的借贷资本。因此，同一枚货币可以反复地作为借贷资本。但同一货币数量转变为借贷资本的可能性，却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如信用制度的发展，商品的流转速度和一般的经济情况等。同时，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以随时改变。当货币数量增加时，可以因信用联系的恶化和现金贮藏的增多而对借贷资本的数量变动不发生作用。所以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一定会使借贷资本的供给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在萧条时期，通货收缩，但借贷资本的供给有时反会增加。因此，货币和借贷资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利息率的高低也不依存于货币的数量。马克思写道：“**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货币紧急的时期，方才对利息率有决定的影响**”，（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8页。）“**如果情形不是这样，通货的绝对量对利息率就不会有什么影响；…**”（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8页。）凯恩斯企图通过货币数量来调节利息率，这是不可能的幻想。

其次，利息率的高低也不能决定投资的多少。我们在叙述凯恩斯的投资理论时已经讲过：利息在资本主义企业利润中所占的比重是愈来愈小了，因而利息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是不大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利润下降，低廉的利息不能刺激投资的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利润上升，高昂的利息也不能抑止投资的浪潮。近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在1960年周期性危机爆发后，联邦储备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回升，曾于6月初把贴现率从4%降低到3.5%，8月10日再降低到3%，另外还设法提高了地方银行的放款能力。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放松银根措施，却不曾对信贷发生显著的刺激作用。相反的，从6月底到8月底止，由于资本家对于借款扩充营业裹足不前，美国各银行的工商业贷款却减少了5.3亿多美元，全年投资只有360亿美元，比原订计划减少了10亿美元。因为危机时期利润的前景是黯淡的，降低利息率也不能鼓励资本家去借债投资。人人都很清楚，借贷资本的需求是决定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和商品销售的条件，而不是决定于利息率的高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总经理艾契尔贝尔格也说：“人们在需要钱的时候才借钱，不会因为借钱便宜而去借钱的。所以利息率的降低对借贷根本不起什么影响。”

凯恩斯吹嘘利息率的“拯救”作用，坚持低利政策，其目的是想实行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工资和保证金融寡头的巨额利润。资产阶级传统的经济理论一直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调节性放在货币工资方面；在不能任意压低货币工资的时候，就把造成经济困难的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凯恩斯反对这个传统理论。他辩称：削减货币工资既不聪明，也不相宜。不聪明，因为它将惹起工人的抵抗；不相宜，因为它将减少社会需求，从而影响一般的经济活动。所以，他主张采取更为巧妙的办法，即由国家实行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从而降低实际工资。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凯恩斯了解到利用通货膨胀来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实行广泛进攻的方便性，他硬说：就业总量依存于实际工资水平而不是货币工资水平；工会只反对货币工资的削减，而对实际工资水平却不能有什么影响。他的结论是：除非在一个已经实行国家统制的社会中，一纸法令便可改变工资政策，否则没有方法可以做到各级劳工工资的一致减低。……另一方面，用公开的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来改变货币数量，已经是许多政府权力以内的事。考虑到人性以及我们的制度，只有傻瓜才会采用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采用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

凯恩斯所主张的金融政策的反动本质，在上述几句话里完全暴露出来了。他所提出的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矛头是针对于劳动人民的。所以，对于凯恩斯所提出的“救治”资本主义的方案，垄断资产阶级特别重视其金融方面的措施，这是很自然的。他的主张在资本主义各国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接受。我们试看战后时期，通货膨胀的浪潮席卷着资本主义世界，便是一个证明。

美国通货膨胀及美元购买力下降情况

年份	通货供应量 (亿美元)	美元购买力
1939	373.9	100
1945	1043.7	77
1952	1319.4	52.3
1959	1479.9	47.6
1968	2147.6	39.9
1971 (年中)	2228.9	32

注：通货量包括货币流通量和活期存款量。

1939年美国通货为373.9亿美元，而1971年增至2,228.9亿美元。社会上的货币数量超过了商品流通所必需的数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物价的上涨和货币的贬值。从1939年到1971年，美元购买力下降了68%。这就是说，1971年一美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939年的32美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从1959年至1969年十年间，英镑购买力下降了29%；法郎下降了31%；马克下降了22%；日元下降了40%。

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是实际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进一步贫困化。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工资的提高总是落后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出版物《经济指标》统计，1969年12月，美国工人工资（不包括农业工人）平均每周为117.62美元，到1970年12月增至122.48美元，即增加了4%，其中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34.89美元增至138.4美元，即增加了2.6%。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5.5%。因此，美国工人工资在1970年实际上下降了1.5%，其中制造业工人工资下降了2.9%。正如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所说的：“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不言而喻，凯恩斯是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最凶恶狠毒的敌人。他主张狠狠地降低工资，但又害怕工人的反抗，于是他一方面向统治阶级献策，要他们采取更为巧妙的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采用他那惯用的方法来欺骗工人群众说：降低工资是防止失业的必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物价不断上涨，凯恩斯分子极力掩盖物价上涨的真实原因，为资产阶级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开脱罪责，并捏造种种“理由”，为压低工资制造舆论，说什么战后时期物价上涨是“需求过大”和“工资过高”造成的。这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大肆宣扬的所谓“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论”。他们还进一步根据这种反动说教来论证提高工资对工人并无好处，因为“提高收入以赶上食物价格的上涨，……只能再度提高物价”，从而又压低实际工资，所以工人最好不要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他们甚至要工人阶级拿出“社会责任感”来，“应以最完善的美德去行动”。肯尼迪在1962年1月11日提出的《国情咨文》中也狂妄叫嚣工人的“理性和公益观念”是防止通货膨胀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广大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既不会受凯恩斯的欺骗，也不会甘心忍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加强剥削。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工人阶级环绕工资问题与垄断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下，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那种见不得人的目的，

于是又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例如汉森便宣扬所谓“高工资低利润”的高度消费经济的谬论，实质上这不过是另一种迷惑劳动大众的花言巧语罢了。

三 “投资社会化”与赤字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主要经济纲领是“投资社会化”。他所谓的“投资社会化”，就是指通过政府管理投资来抵制私人投资的周期波动的一种政策。它包括两个方面：管制私人投资与实行公共投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管制私人投资的说法，只是欺人之谈。资本家经营生产的目的是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经济景气时期，政府没有办法限制资本家继续扩充生产；当危机和萧条出现的时候，商品堆积如山，一般企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政府也不能勉强资本家从事投资。英国工党在《英国劳工信仰》一书中完全承认了这一点：“假如萧条的征候再度出现的时候，政府将鼓励私营企业继续订购新装备。假如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最后我们也还不能强迫私人投资者去投资。”这说明，管制投资不能作为克服危机和消灭失业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首先就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什么反对金融寡头的措施。所以，凯恩斯着重的不是管理私人投资，而是实行公共投资。根据凯恩斯的见解，政府筹措公共投资的费用，不能采取增税的方法，而只能采取举债的方法，换言之，就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

公共投资和赤字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的经济纲领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凯恩斯认为：在消费心理不变时，救济失业的办法是投资，如果私人不肯投资，那么就只有依靠政府投资了。从凯恩斯的观点看来，假如充分就业时的国民生产是2,000亿美元，根据消费心理，人们的消费支出是1,200亿美元，根据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互关系，私人投资是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社会需求的不足，政府必须维持5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才能使国民支出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从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

一些凯恩斯的信徒，又把他所主张的公共投资政策分为两类：（一）“打气”的政策，就是说当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本家对企业丧失了信心或其他原因而使经济陷于停滞状态，这时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往往可以调整物价与成本的关系，或消除资本家的悲观心理，从而促使经济自动地复兴。这与一个心脏忽告停顿的人，需要打吗啡针来刺激一下是同样的道理。（二）“补偿”的政策，就是用公共投资来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犹如病人的心脏机能恢复后，须常吃补药以补其营养的不足一样。

由此看来，凯恩斯的公共投资政策的目的，据说是要借助于财政政策来维持最高的就业与生产水平以及最大量的购买力。四十年代，凯恩斯分子又把这种公共投资政策改装成一套更为完整的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它的具体内容是：在经济高涨时期，政府可以增加赋税和减少开支来消除过多的需求；而在衰退时期，政府可以增加开支和减少赋税来提供更多的需求，以起相互“补偿”的作用。“补偿性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这一政策在资本主义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财政政策的核心。四十年代以来，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颁布了体现这个补偿性政策的法案。联合国也曾在战后指定一批“专家”研究补偿性措施在一国国内和在国际间实施的问题。1946年美国的“莫莱充分就业法案”规定：私人投资降到“支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数量以下”的时候，国家就应当进行直接投资。这样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的比重。

美国政府的采购和劳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1929	1935	1946	1955	1960	1965	1970
百分比	8.1	13.7	14.4	19	19.8	20	22.5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大危机前的 1929 年，美国政府用于采购和劳务的总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1%。在罗斯福根据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 1935 年，就提高到 13.7%。战后，1946 年又上升到 14.4%，此后一直维持在大约 20% 的水平。1970 年，美国政府的采购和劳务开支高达 2,194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5%。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也是一样。战后英国通过预算的投资几乎占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法国三分之一以上，西德接近 30%。

尽管凯恩斯及其信徒们对于公共投资的作用大吹大擂，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这到底能不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呢？

公共投资不外是政府投资于生产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就投资于生产事业来讲，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一，公共投资不能全部补足私人投资的减少，同时它也不可能在长期萧条中反复地投资下去。因为这是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相矛盾的，当公共投资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将会动摇整个“私有企业”的基础。

第二，国家大规模投资于生产事业，将同资本家企业直接发生竞争，反而会使危机更加强化和尖锐化起来。

第三，脱离消费发展生产，含有惊人的内部矛盾。不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和个人消费亦步亦趋。但这种独立性只存在于一定限度内，归根到底，生产是以消费为转移的。一个国家不可能继续不断地投资来生产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而不必考虑产品的最后销路——人民的消费。对于这一点，连凯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每一次我们通过投资的增加来获得今天均衡的时候，我们却增加了明天求得均衡的困难。”

就政府投资于非生产性的社会福利事业来讲，这一措施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首先，政府投资于社会福利事业，势必牵涉到收入的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会违背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把国家的资金大量投于社会福利事业。因为，在现代的条件下，它从属于垄断组织，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它只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决不可能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何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社会福利事业也是通过买卖方式来“服务”的，既然通过买卖，那就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充分享受，广大劳动人民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平时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更谈不上支付一笔额外费用来享受这些社会福利。所以这些社会福利事业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有名无实。除此以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指出，即不论是投资于生产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公共费用的支出，都必须用增加赋税或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结果全部负担还是落在人民群众的身上，使劳动大众更加贫困，社会购买力更加低落，生产必将进一步的收缩。由此看来，凯恩斯企图通过公共投资的措施，来使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也是办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要宣扬社会事业是反危机措施的最理想形式。然而到 1940 年时，他也感到政府投资于社会事业的作用不大，于是他的眼光就转到国民经济军事化方面来了。他写道：“在最近整个时期，投资费用水平很低，毫无解决问题的希望，……显然，就资本主义民主而言，在政治上不可能使开支达到足以证明充分就业的伟大试验所需要的水平，而战时条件则为例外。”他还露骨地说过：“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指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引者）之薰染太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

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里，他公然提出经济军事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后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走上了经济军事化的道路。政府支出主要的不是用于修建学校、医院、公路、房屋，而是用于扩充军火生产和建立战略据点。庞大的军事费用被说成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军火生产被看做刺激工业发展的有效方法，于是在战后年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军费支出就扶摇直上，见下表。

美国的直接军费开支（单位：亿美元）

年度	期内共计	每年平均
1917-1919（第一次世界大战）	213	71
1920-1938	189	10
1939-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	2546	423
1946-1963	6775	376
1964-1970	4495	749

从1946年至1970年，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共一万一千多亿美元，平均每年在四百五十亿美元以上，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每年平均数。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便愈来愈依靠军火生产。现在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军火生产成为整个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国际形势稍有一些缓和的迹象，就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震动。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所主张的“投资社会化”，在实践上一变而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得更适合于战争。这说明凯恩斯是怎样为垄断资本扩军备战政策出谋献策的。英国的凯恩斯分子卑弗利支说：“到现在为止，民主国家所发现的解救失业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总体战争。”（《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这句话已经成为好战分子的口头禅了。

国民经济军事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虽然可起一种暂时刺激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是它将使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解决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在经济军事化的前一阶段，由于扩大了生产能力，增加了就业人数，因而刺激建筑业、机器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一般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军事化的后一阶段，由于扩大军事生产所引起的沉重赋税和高昂的物价，降低了人民的购买力，最后必然要酿成更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民军费负担逐年增加的情形。在美国，每人平均负担的军费：1913-1914年度为3.5美元；1929-1930年度为7美元；1954-1955年度为250美元；1959-1960年度为291美元。现在尼克松政府三番五次扩大军费开支，使美国1974财政年度的直接军事预算增加到811亿美元，占预算开支总额的30%。美联社说：“十二年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国防预算将是有史以来——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最大的预算。”“这个数目超过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开创的早先纪录799亿美元。”很明显，巨额的军事费用是由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榨取来支付的，于是劳动人民更加贫困了，人民的购买力更加低落了，其结果是使生产能力和日益缩小的人民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越来越靠庞大的军费支出来维持虚假的繁荣，这好象一个有吗啡嗜好的人一样，开始注射的时候，觉得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后来变成麻醉剂瘾者，每次旧病复发，需要注射更多的吗啡才能“起死回生”，可是越来越多的注射，终于不免要毁坏自己的肌体，直至中毒而死。所以凯恩斯对消灭危机和失业所提出的一套纲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不过是资产**

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不管凯恩斯分子嘴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他们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垄断资本家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结果是累进税变成了群众的负担，公共工程变成了军火生产，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凯恩斯全部纲领的真正目的。对于这一套纲领的反动性，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四 对外经济扩张政策

凯恩斯的《通论》是以“封闭的社会”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没有涉及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但是他的“理论”体系同样可以应用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而且正好迎合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

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业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国内和国外投资额的大小。国内投资取决于利息率的高低；而国外投资则取决于贸易顺差的多寡。在经济萧条时期，一国如能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样可以提高社会需求，从而创造较高的国民收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政府扩大贸易顺差，既可增加国外投资，又可带来黄金进口，降低利息，以刺激国内投资活动，这“实在是一箭双雕”。汉森也说，增加出口，直接使国内消费品工业得到刺激，间接又推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充，因而整个工业得到刺激。马柯洛普在他所著《国际贸易与国民收入倍数》一书中，甚至吹嘘扩大出口可以导致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据他说，贸易顺差对于国民经济总是有利的，而且，这种利益不限于第一次国民收入的增加，由于“倍数”的作用，国民收入还可以成倍的增长。总之，凯恩斯及其门徒将他的“就业理论”应用到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时所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越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则国民收入的增加也就越大。一国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就可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从而获得高水平的就业和生产。

凯恩斯分子的这一辩护性谬论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是一个极大的煽动和鼓励，它已成为现阶段帝国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上。

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美	113.6	119.2	125.6	159.6	168.4	187.6	202.8	231.2	258.8	287.2
西德	112.0	117.2	129.2	144.0	159.2	180.0	194.8	222.8	262.4	306.8
英	89.6	91.6	98.0	105.6	114.8	122.8	121.2	130.0	150.0	163.2
法	52.0	54.0	58.4	64.8	73.2	79.6	84.4	94.0	110.4	134.0

注：美国输出中不包括军火等特类货品。

近三十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增长尤为迅速。193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总额为528亿美元。到1970年时，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总额已增至3000亿到3200亿美元，比1938年大约增长了5倍。其中以美国增长最快，从1938年的115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55亿美元，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美国资本输出增长了12倍多。

非常清楚，凯恩斯分子大力鼓吹的扩张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695页。）这是一切反动派发展的必然规律。事实正是如此。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不择手段对外巧取豪夺，曾经形成国际市场的一场混战。混战结果，不但没有使它们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一切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凯恩斯也意识到，各国竞相实行扩张政策，是会造成不良后果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大，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来谋求世界经济的稳定，并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扩张的工具。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一项“关于国际结算联盟的建议”（即所谓“凯恩斯计划”），后来这个“建议”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基金计划”，现在联合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根据这一计划建立起来的。战后，美国凯恩斯分子为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作辩护，比起凯恩斯本人来更富于蛊惑性。汉森就大力鼓吹在全世界范围内“调节”经济，以便“达到劳动的充分就业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他还无耻地宣称：“美国的繁荣和充分就业，是世界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根本前提”，“美国对于国际经济合作机构积极而有力的支持的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战后世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另一个著名凯恩斯分子哈里斯也要求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协调”行动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听起来，这些蛊惑性宣传好象是一个很动人的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新思想”，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些欺骗人民群众的花言巧语罢了。它含有明显的阶级意图，这就是：（一）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扭转三十年代相互厮杀、两败俱伤的局，企图以此“防止”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危险；（二）在国际合作的幌子下，使帝国主义扩大对外侵略合法化。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和“共同安全计划”等，除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外，还想在“援助”和“发展”的幌子下，来实现其转嫁危机和加强掠夺的罪恶目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今天，凯恩斯分子玩的就是这套把戏，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把对外经济扩张这个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政策，涂上“国际合作”的色彩，进行招摇撞骗。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国际合作”的旗帜下面，是一副凶狠、狰狞的侵略者的嘴脸。

总起来讲，赋税政策、通货膨胀政策、赤字财政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四项基本政策。凯恩斯的“理论”是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捏造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引申出来的经济政策，则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的。他企图从理论方面，政策方面找到“消灭”危机和失业的方案，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合理性”，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意志，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这自然是枉费心机。在马列主义光辉的照耀下，在世界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这一反动的伎俩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第四章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及其实践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垄断资本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不仅继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反科学的基本论点，而且较之它以前的庸俗理论更为反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主流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干涉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是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相适应的，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集团日益同国家权力相结合的要求，于是凯恩斯主义就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了。十多年前，美国垄断组织设立的“经济发展委员会”所公布的报告中就带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这个委员会的发言人说道：通过赋税和公共支出（包括公共工程的开支）、国债的明智处理，以及信贷和货币的开明管制等建设性政策，能够大大延缓或者防止经济循环的过分震动。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出版的《美国的私人企业制度》一书里极力拥护采用以政府开支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纲领。在自由主义的人们中，凯恩斯主义也受到欢迎。这一点可从英国的卑弗利支计划来证明。卑弗利支是被资产阶级作家捧上天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在经济理论上完全与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

凯恩斯主义不独适合垄断资本的需要，而且可投一切改良主义者和假社会主义者之所好。它可当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人解释凯恩斯主义之所以风靡于资产阶级思想界时说：“在三十年代，凯恩斯着重的是用公共开支来挽救萧条。这个主张打动了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心弦，因为这个主张看来好象足以消除资本主义最大的弱点——失业，却用不着进行重要的制度上的改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于称赞凯恩斯，说他帮助西方各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不需经过阶级斗争而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好象不需要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财产权利，也不需要终止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什么都不要动，只要依据凯恩斯方案，通过一个逐渐的社会发展，就可从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目前已成为全世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纲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也被右翼社会党首领偷运到工人群众中去。正如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所指出的：“更糟糕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幻想也传染到许多工人的头脑里。凡此种种，严重地威胁着工人阶级。”他在1958年12月19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还说，一种混乱的罗斯福式的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起着很大的危害作用。

由此看来，凯恩斯主义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它吸引着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从亿万富翁一直到右翼社会党人和工人贵族。这些人之所以参加凯恩斯主义的大合唱，不外以下三个目的：

（一）他们都关心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巩固资本主义；（二）他们都拥护国家干涉经济的措施；（三）他们都企图用“充分就业”的口号来骗取工人的信任。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凯恩斯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它含有以反对社会主义和“挽救”资本主义为中心目标的一套经济纲领。凯恩斯主义的全部意义，也就是企图在国家调节经济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制度从日益深刻化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在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时期，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抓住凯恩斯主义的纲领，就好像抓住救命圈似的，拿来医治资本主义的不治

之症。今天英、美、法、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在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实行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国家干涉经济的计划，干涉的目的在于运用通货膨胀，降低利息，举办公共工程和实行社会保险等措施来提高消费和刺激投资，以便减少失业和克服危机。这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纲领。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莱充分就业法案”，这个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的政策 and 责任就是要维持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据说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庞大的抵制危机的计划，其中包括有经费为1,010亿美元的筑路计划和经费为2,00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计划，用来“对付可能发生的萧条”。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运用。在英国，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曾于1944年根据凯恩斯纲领发表了“就业政策白皮书”。这一白皮书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高度的生产水平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的就业水平是由支出的数量决定的，“假如对商品和劳务的公共需求维持在一个高度的水平上，国家就不会遭受群众失业的痛苦……花在商品和劳务上的钱愈多，花在工资上的钱也将愈多，而就业也将增加”。这充分反映了凯恩斯的思想，1945年工党上台以后，曾经依据凯恩斯纲领编制了“1949-1952年四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投资计划化”来消灭失业现象并保证英国经济的无危机的发展。所以凯恩斯的经济纲领也成为工党政府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础。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凯恩斯的经济纲领也不遗余力，于是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遂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现象。

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理论，它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另一方面又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调节就可以永远保持下去，万世长存。凯恩斯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提出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凯恩斯的唯心主义的说教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彻底的破产，这可以从英、美两国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期创立了许多设计机构，并采取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其中包括一个扩大国家开支的赤字花费计划。例如：（一）在金融方面，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来刺激国内物价和对外贸易，并通过复兴金融公司和联邦储备银行对工商业实行大量低利贷款，以挽救和恢复那些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二）根据“产业复兴法”把各个企业单位按照产业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规定该产业部门的生产量，以避免彼此竞争而造成生产过剩；（三）根据“农业调整法”限制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价格，并通过放宽信贷的办法来“挽救”农业的危机；（四）在公共工程方面，政府举办了水力发电、灌溉、防汛、航运等公共事业，其中有著名的“田纳西”工程，这是所谓提供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的直接政府支出。从1933--1940年间，罗斯福政府在公共工程、农业津贴以及各种支持消费的措施方面，一共花了320亿美元。尽管如此，整个经济并没有能够恢复起来，却转入了斯大林所说的“特种萧条”。1939年美国的失业工人还有900万左右，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终止了危机的继续发展。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干涉，设立了“战时生产局”、“物价管理局”和许多其他管制经济的机构，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垄断资本同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在1917年就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其结果是，它使垄断资本获得空前庞大的利润，却给劳动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战后，美国政府又挂起“繁荣经济”、“救济失业”的招牌，以和平时期空前未有的规模来管理经济。在195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手忙脚乱地采取措施，企图抵制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例如加速进行公共工程，紧急建造房屋，增加军事拨款以及加速签订军事订货等。肯尼迪上台时，正值美国爆发了战后第四次危机。他象艾森豪威尔一样，把

军火生产作为医治经济衰退的主要药剂。然而，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团不得不承认：即使在 1953、1957 和 1960 年三个经济高涨时期，美国的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 2.6%、4.1%、5.2%。这当然是美国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但是，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的失业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也曾强调指出：“从更长时期来看，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就象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一样，以军事刺激为基础的经济恢复期间将是有限的，新的衰退或危机将继之而来。同时，在美帝国主义这一恐龙身上每加一层军火，就使它更加呆钝，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缓慢，并使赋税的负担和广大群众的失业增加。”

1969 年 8 月美国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尼克松政府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凯恩斯的“扩展性”经济政策，大搞赤字财政，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放宽信贷，妄图刺激经济。但是，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是，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通货恶性膨胀，黄金大量外流，终于 1971 年 7 月又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财政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使美国统治集团慌了手脚。为了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政府抛出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美国暂时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二）对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附加税；（三）冻结工资、物价和房租九十天；（四）实行对新装备投资减税，等等。尼克松政府在提出这套经济措施时，大吹大擂，说什么要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实质上，这一套措施只是对内加强压榨劳动人民，保证垄断高额利润，对外转嫁危机的破烂货。这显然是凯恩斯经济纲领的进一步运用。他们讲的冻结工资和物价，冻结工资是真，冻结物价是假。根据官方编制的大大缩小了的美国生活费用指数，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三个月（九、十、十一月份）每月上涨了 0.2%，折合年率为 2.4%。从 1971 年 11 月 13 日开始改冻结为管制，限制每年物价上涨率不超过 2.5%。但这种“管制”只是限制广大职工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阻止垄断资本家利润的巨大增长。事实上，象伯利恒钢铁公司和国民钢铁公司这样一些大垄断企业已获准加价 7%，而十二月份生活费用指数上涨了 0.4%，折合年率为 4.8%，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限额。物价继续上涨，而工资不动，这岂不是向劳动人民开刀吗？“新经济政策”还规定减免汽车销售税 7%，新设备投资第一年减税 10%，第二年减税 5%，只是减免了资本家的赋税，增加了他们的利润，而劳动人民的捐税负担却有增无减。在这里，“新经济政策”劫贫济富的反动本质，更是昭然若揭。然而事实表明，垄断资本的这种绝望挣扎是无济于事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美国财政经济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1971 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 20.4 亿美元，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按官方交易结算，这一年国际收支逆差达 310 亿美元，约为 1970 年逆差的 3 倍。1971 年 12 月份工业生产指数比危机前 1969 年 7 月低 3.7%，失业率上升到 6.1%。1971 年全年制造业生产设备利用率只有 74.5%，是侵朝战争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切都说明美国经济仍陷于严重危机之中。“新经济政策”解救不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只不过使美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更加尖锐而已。

英国工党政府在战后时期所制定的臭名远扬的“1949—1952 年四年计划”，就是依据凯恩斯的经济纲领——“刺激投资”、调整利率等方案来制定的。英国工党政府企图通过这个计划来保证英国经济的无危机发展及消灭失业现象，但这个计划也和其他任何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尝试一样，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了。在“四年计划”施行期间，英国许多极重要的经济部门依然生产萎缩或停滞不前。当时，英国是处在严重的经济震荡和大规模失业的时期。例如：铁矿石开采量 1948 年为 399 万吨，1949 年几乎停滞在同一水平上，为 4,08,000 吨，而在 1950 年则下降到 3,811,000 吨。锡的熔炼量由 1948 年的 31,500 吨下降到 1951 年的 26,500 吨，这甚至还不及 1937 年水平的 70%。铝的产量在 3 年内由 30,500 吨下降到 28,200 吨。1951 年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炼钢工业

仅为 80%；造船业为 65%；化学工业为 67%；纺织工业为 60%。在这期间，英国还遭受到尖锐的燃料危机，爆发了剧烈的外汇危机。在“四年计划”期满后，英国的失业人数仍有 120 万人。

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或是英国的“四年计划”都不能摆脱经济危机和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主义的“伟大试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二 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经济

近二十多年来，凯恩斯的神话在资本主义各国又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一些凯恩斯主义乐观派硬说，象 1929-1938 年那样的大萧条、大摆动是不会有，战后年代危机比较缓和，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反衰退措施。有人甚至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可以无危机地发展了。事实的真相是怎样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依据凯恩斯纲领实行大量的军费支出以及其他各种花费，却没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就美国来讲，战后已经爆发了五次生产过剩危机：1948-1949 年，工业生产下降了 10.5%；1953-1954 年，工业生产下降了 10.2%；1957--1958 年，工业生产总量比 1956 年 12 月份下降了 14.3%，超过了前两次衰退的幅度。1960 年，美国还没来得及克服第三次经济危机的全部后果，又面临新的经济震荡的威胁。从 1969 年 8 月开始的第五次经济危机到 1971 年 8 月已经持续了 25 个月。25 个月中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 6.1%，直到 1972 年初，工业生产指数仍未恢复到 1969 年 8 月份以前的水平。这是美国在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危机，它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就象患了慢性的不治之症一样，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由此可见，战后年代不是危机消失了，而是危机更加频繁了，经济周期更加缩短了。在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则为六年，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周期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以美国为例，战后第一次危机的周期从 1948 年到 1953 年为 4 年 6 个月；第二次周期从 1953 年到 1957 年为 3 年 7 个月；第三次周期从 1957 年秋天到 1960 年 2 月只有两年多。这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成了经常失业现象特别严重的国家。工业开工日益不足，成了那里的经常现象。在战后年代里，尽管靠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增加军事拨款，但是生产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频繁了。

诚然，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具有许多特点：周期缩短了，周期的阶段不很显著，危机开始前并不曾有真正的高涨阶段等。但是这种情形的产生，是由于一些新的客观因素，例如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对外经济扩张的加强等，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了再生产的进程。换句话说，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战后经济的周期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周期完全变形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没有严格的周期性规律，正如病入膏肓的人没有正常的呼吸一样。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解释。前面讲过，由于凯恩斯分子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迅速。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加强，国家在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断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拨款和其他政府支出规模不大，因而对再生产进程不曾发生什么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干涉已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政府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在 1916 年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时候，美国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只占 1.5%，而到 1970 年，美国

政府的采购和劳务开支竟高达 2194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5%。英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8%，法国 19.8%，西德 13.4%，日本 11.6%。这些数字表明，政府开支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

其次，由于国家信用和银行的密切结合，既加强了国家对信用的控制，又加强了银行的地位，这就为垄断组织保证了极有利的金融市场。

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组织和国家机构结合在一起，并利用国家机构来干预国内经济以保证垄断高额利润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于是国家的影响空前增大。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延缓危机的到来，采用了一系列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但是，就实际情况看来，任何抵御经济危机的“防护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它可以暂时拖延危机的发展，但拖得越久，陷得就越深，这是必然的。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家进一步控制国家机构，利用国家权力，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以获取高额利润和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列宁指出：“**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1 页。）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比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更为反动的体系，它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资本主义经济更加不稳定了。凯恩斯分子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混合经济”、“福利国家”或“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战后，美国已经爆发五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每次危机期间，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手里，他们的垄断利润迅速增长，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这都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

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不是危机的缓和与失业的减少，而是垄断利润的激增。因为一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不外是列宁所说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8 页。）使垄断组织获得空前未有的高额利润。例如 1940 年至 1949 年，美国公司的每年平均利润为 243.56 亿美元，1960 年至 1969 年，激增为 674 亿美元。

利润的增长更加扩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月报》发表的数字，美国国民生产和消费总值对照如下（单位：亿美元）：

	1929	1941	1950	1967	1969	1971
生产总值	1031	1245	2843	7939	9303	10504
个人消费	772	806	1910	4921	5795	6649
	259	439	938	3018	3508	3855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差额就是一道鸿沟。1929 年是 259 亿美元，1950 年是 938 亿美元，1971 年是 3,855 亿美元。当 1971 年全国生产总值提高到 1929 年水平的 10.2 倍时，个人消费仅提高到 1929 年水平的 8.6 倍，这道鸿沟便扩大为 1929 年的 14.9 倍。所以利润的榨取和实现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美国经济里日益尖锐化了。因为只有高度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巨额利润才能实现，再投资才吃香，然而当产品没有销路、仓库存货无人问津的时候，利润的积累愈快，经济不稳定性的威胁也就愈大。

企业倒闭家数统计表

年份	倒闭数	每一万家倒闭率
1945	810	4.2

1949	9246	34.4
1952	7611	28.7
1953	8862	33.2
1954	11086	42.0
1957	13739	51.7
1961	17075	64.4
1965	13514	53.3
1970	10748	43.8
1971	10326	41.7

经济的困难和竞争的剧烈使大批中小企业遭到破产，从而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除了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外，现有企业开工不足现象愈来愈严重了。战后美国生产设备能力平均每年增长 8%，而生产量平均每年仅增长 3%，因此企业经常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通常只能利用 80% 左右。1948-1949 年和 1953-1954 年两次危机时期，开工率是 82%；1957-1958 年开工率最低降到 70% 以下；1959 年开工率不过 75-80%。

长期的大量失业依然是当前美国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战后，尽管美国生产在增长，可是失业规模始终庞大，特别是近几年来，失业人数还逐年上升。根据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失业人数从 1968 年的 280 万人上升到 1971 年的约 500 万人（最高月份达 550 万人），增加 78%；同期，失业率也从 3.6% 提高到 5.9%，增加 63%。1971 年美国失业人数是战后 25 年的最高峰，失业率也是十年以来最高纪录。1972 年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始终徘徊在 5% 至 6% 之间，保持着近 500 万人的水平。事实上，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不包括找不到工作而放弃寻找职业的人和一些半失业的人，因此实际失业情况要比官方公布的严重得多。据《纽约时报杂志》称：半失业的人有单纯失业问题三倍到六倍那么大。失业和半失业人数的增长是美国危机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标志

从国家债务的不断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方面也明显地反映出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前面已经讲过，战后时期，美国统治阶级及其经济学者认为，根据凯恩斯纲领扩大军费支出，便可以保持“繁荣”，“摆脱”危机。然而穷兵黩武，政府就得大量花钱，政府的庞大开支，除了靠增加税收和滥发钞票来筹款以外，只有借债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于是国家债务就扶摇直上了。1946 年以来，联邦政府公债增加总额达 1,460 亿美元，到 1971 年 12 月，国债累计已达 4,241 亿美元，平均每人要负担 2,000 美元以上。这完全是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花费的结果。这样巨大的债务，对于财政信用系统自然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已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每次猛烈的经济衰退都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予以抵制，而在国债保持在目前水平的情形下，采取进一步的赤字花费，将会导致整个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然而凯恩斯分子却说，预算赤字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在危机年代出现的赤字，当高涨的年代来到时，将会得到补偿，所以国债是不会大量增加的。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一捏造的谎言。从 1946 年至 1971 年（日历年度）的 26 年中，有 19 年出现财政赤字，而且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看看下表所列的数字：

战后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长趋势(单位：亿美元)

年度	财政赤字		国债增加额	
	总额	每年平均	总额	每年平均
1939 年		39.67		
1946-50 年	65.26	13.05	-214.07	-42.81

1951-55年	251.49	50.29	240.61	48.12
1956-60年	71.53	14.31	94.47	18.89
1961-65年	332.09	66.42	306.88	61.38
1966-71年	658.56	109.76	1032.27	172.05
1946-71年	1378.93	53.04	1460.16	56.16

注：日历年度。

财政赤字系赤字年度的赤字总数，未以盈余年度盈余数抵销。

战后美国国债的增长是惊人的。甚至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埃伦德也说：美国“国债的数字真是太大了。如果换成一美元的纸币，它可连成35英尺宽的带子绕过月球后再返回地球，或者环绕赤道1,520圈”，“它需要大约171年来印刷这些纸币”，“这个数字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债务总额还要大”，使人感到震惊。

近二十多年来，他们又提出一种“国债哲学”，即认为国债增加几乎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是“我们欠我们自己的钱”，凯恩斯分子艾里斯说：“经济学家们一致承认，国债的数额由于这样一个理由而是无关紧要的：每一张债券是一份资产，也是一份债务……。如果社会是债务人的话，那么社会也就是同等款项的债权人（假定……债务象我们的国债那样属于本国人所有）。”（《资本的神权》）由此引伸出来的逻辑结论是：通过政府举债实施庞大的政府开支来引起繁荣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

这种新型的“国债哲学”是极其荒谬的，它经不住事实的考验。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债权人和债务人显然不是同一的人，持有债券获得利息的是资产阶级，而负担赋税、支付利息的主要是劳动者。其次，国债的空前增加，必然使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和财政更加紊乱和不稳定。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到这种简单的收支关系，收入80元而支出100元，这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吗？在美国，人们也不免要问：“一个人如何能因赤字增长，债台高筑而反倒有好日子过呢？遵循这样的政策，难道有任何国家，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在经济上不会走上破产的道路吗？”

由于国债不断增加，利息负担也日益加重。1953年，预算中的利息支出是65亿美元，而在1971财政年度这笔支出竟高达219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支出的10%。仅仅是国债利息一项，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100美元以上。它不但成为美国广大人民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是对美元的一个严重威胁，因为国债利息扶摇直上，预算赤字就愈大，通货膨胀就愈猛，这必定影响美元信用，促成金融危机。

除政府债务外，美国的私人债务也激增无已。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月报》统计，1970年底，美国的私人负债（包括房屋抵押和消费信用）总额达到5,779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2,832美元。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这就使生产力和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

庞大的公私债务使得美国的财政金融系统出现了极端危险的局面。甚至美国一些报刊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债务的“金字塔”，衰退中的美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当得了。因为国家债务和私人信用贷款的增长，实际上等于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威胁。人人都清楚，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从缓慢的通货膨胀变成快马加鞭式的通货膨胀，最后可能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拖上完全破产的道路。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情形下，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感到不安，于是发出反“凯恩斯革命”的呼声，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足以说明美国经济情况的严重性。

同时，由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引起国外对美元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对外贸易的竞争能力，这就造成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和大量黄金外流。战后美国黄金储备日益减少，而美元外债却不断增加。见下表：

美国黄金储备和短期外债（单位：亿美元）

年份	黄金储备	短期外债
1946	207	73
1949	246	77
1954	218	129
1957	229	158
1958	206	168
1959	195	194
1960	178	210
1961	169	229
1965	138	291
1963	119	418
1970	111	438
1971年11月	102	626

注：年份为年末数字

现在，外国政府手中随时可以向美国兑换黄金的美元就有 320 亿，再加上私人持有的美元，共有五百多亿，可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 97 亿美元，还不够抵偿国外美元债务的五分之一。美国的黄金储备同短期外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国际收支每况愈下，于是美元信用急剧下降，持有美元的人担心美元贬值的损失，这就引起西方金融市场经常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美元摇摇欲坠了。从 1960 年 10 月到 1973 年 2 月，美元连续爆发了九次严重的危机，美国政府两次被迫宣布美元贬值，由于美元信用发生根本动摇，美元陷入一蹶不振的惨境。目前美元危机尚在发展中，美元危机是美国经济不稳定性在金融领域内一个明显而集中的表现。

从上述种种情形看来，尽管战后美国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它的实际经济情况却更加恶化了，经济危机连绵不断，美元地位岌岌可危，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沉重的赋税，巨额的国债，可以说是百孔千疮，险象环生，决不象凯恩斯分子所幻想的那样美妙。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广大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引起普遍的不满。在 1960 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被迫承认美国的困难重重，它指出：“不论谁当下一届（美国）总统，他都会遭到困难，而且是巨大的困难。这就是：预算的困难，赋税的困难，劳工问题的困难，美元的困难，农业的困难……。”在困难重重下，一个一个白宫主子都束手无策。尼克松一再惊呼：美帝国主义面临“动乱的深渊”，美国“遇到的挑战，从来没有象我们上任时遇到的那样多，那样严重”，美国处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在铁的事实面前，凯恩斯分子所谓战后危机减弱和无危机地发展的蛊惑宣传就不攻自破了。

总起来讲，战后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很不稳固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日益深刻化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横排本，第 1203 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战后美国形势发展的科学分析。可以断言，

资本主义将不断地向着新的经济震荡和社会震荡走去，直到最后灭亡。事实证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各种矛盾空前尖锐，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没落的阶段。而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下，西方资产阶级难道还能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吗?!

结束语

总结上面的分析，凯恩斯主义是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它企图证明，借助资产阶级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就能防止危机，消灭失业现象。这是一种烟幕，它的暗中用意，是为金融寡头利用国家机器加紧掠夺劳动人民和获取最大限度的垄断高额利润提供理论根据。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对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正是由于这一情况，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风靡一时，它不仅统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支配了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政策，而且也危害着工人运动。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挑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因此，彻底揭露和批判凯恩斯理论的反动性，打倒这个最凶恶的思想敌人，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书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结合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驳斥，希望能帮助读者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实质有所认识。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修改时间又很短促，缺点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什么是凯恩斯主义

作者=彪如著

页数=87

SS号=10502803

DX号=

出版日期=1974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